

·调查与思考·

理性选择、外部激励与 新农保连续性参保*

——基于四省的调查

姚俊

【摘要】2012年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后,其连续性参保对于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通过对全国新农保最早试点地区856名农村居民问卷调查数据资料的分析发现,从连续性参保来看,农民的参保行为仍然存在自愿性不足的问题,其连续参保行为是关系与结构“双重嵌入性”的结果。在新农保实施初期政策执行上的激励作用要强于利益激励。因此,应当从转变新农保激励机制和适时启动“强制性”参保原则两个方面解决农民连续性参保动力不足的问题。

【关键词】经济理性 社会理性 外部激励 连续性参保

【作者】姚俊 南京医科大学人口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称“新农保”)自2009年试点以来,有关农民参保意愿和行为的研究一直是实证研究的主要内容。大部分研究关注农民是否参保和选择何种缴费档次参保,多数实证研究停留在静态视角上,分析某一时点农民的参保行为。养老保险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连续缴费才能受益,社会养老保险通常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其连续缴费的强制性。新农保虽然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养老保险,在执行上却遵循政府主导与农民自愿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农民的参保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和实施成败。因此,对农民参保行为的关注不仅在于参保的“广度”和“深度”,更在于参保的连续性。事实上,研究者较早关注到连续性参保问题,并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在连续性参保的重要性方面,林义(2009)、刘向红(2011)认识到“农民长期参保意愿不足,由此造成的新农保筹资面临不确定风险已经成为新农保制度运行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而来自新农保替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嵌入性视角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编号:09CSH044)的阶段性成果。

代率的精算模型分析也证明了连续长期缴费对于提高新农保保障水平的重要性(贾宁、袁建华,2010;邓大松、薛惠元,2010a)。在农民的长期缴费意愿方面,诸多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特别是中青年农民的长期缴费意愿不足,即使参保,中间断保的可能性也较大(贾晓华、徐世江,2012;邓大松、薛惠元,2010b)。农民连续性参保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新农保政策的稳定性、基金运行质量、捆绑式参保条款、缴费年限激励机制、养老保障水平和农民的思维习惯等(贾晓华、徐世江,2012;马杰、陈玉照,2013;张永春等,2014)。

以上研究充分认识到连续性参保问题的重要性,但缺少必要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撑。随着2012年底新农保制度实现了从试点到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的全覆盖,更多研究就农民连续性参保的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顾文静(2012)通过对广东佛山的调查发现,有持续参保意愿的农民不足50%,制度激励因素对农民持续参保意愿有显著影响;黄瑞琴(2013)在湖南两个贫困县的调查发现,新农保参保率存在下降的趋势,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家庭联动缴费”制度、外出务工错过缴费时间等是参保农民断保的主要原因;吴玉锋、周明(2014)对甘肃会宁县已参保农民的连续性参保意愿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超过一半参保者有中途断保的可能,其中农民对新农保的认知、信任等主观因素对连续性参保有显著正效应,而客观因素的影响力较小,仅表现在年龄、身体状况和干部身份上。

总的来说,关于新农保连续性参保的实证研究偏少,并且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的范围较窄,以个别地区的调查为主,缺少较大范围内的实证调查,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不足;(2)研究的动态性不足,上述三项研究都是在新农保实施1年后进行的,无法充分反映农民参保行为的动态变化过程;(3)偏向于意愿分析,有关参保行为的研究不足,事实上农民的参保能力—参保意愿—参保行为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统”,动态视角必须落实到其参保行为的连续性上来。针对上述不足,本文试图通过对全国较早试点地区的问卷调查来分析农民连续性参保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而考察新农保制度的政策与实践如何更好地转化为农民的连续性参保动力。

二、研究假设与数据来源

连续性参保涉及农民的连续性支出,并且这种支出是一种收益滞后性明显的投资性支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连续参加新农保是一种金融投资,属于典型的经济行动。在新经济社会学“结构—行动”分析路径看来,任何经济行动都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当中的,受到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非经济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新农保遵循的是政府主导与自愿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农民的连续性参保行为又是各种激励机制作用的结果。总的来说,参保行为不仅是农民个体的理性行动,也受外部激励的影响;不仅是经济理性结果,也是社会结构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按照“经济人”理性假定,个体的经济行动必然遵循“追求代价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原则。新农保的连续缴费对农民并不构成经济上的负担(薛惠元,2012),也就不

存在生存理性上的压力。而在中国农户经济行为从生存理性转向经济理性的时代背景下, 农民的连续参保行为更多是一种“成本—收益比”的判断。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1: 经济理性假设。农民连续参保的预期收益越大, 就越可能做到不间断连续参保。

关于农民的经济行动, 学术界一直有“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之争。文军(2001)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出发, 指出农民的理性选择存在层次性, “社会理性”是在“经济理性”基础上更深层次的“理性”表现, 满意准则和合理性是“社会理性”行动者的行动基础。农民在连续性参保上的决策比较复杂, 特别是在参保不存在生存理性压力的背景下, 其“理性选择”行为也是多元的, 非经济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科尔曼(Coleman, 1990)所说, “理性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 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 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2: 社会理性假设。农民的参保行为不仅是寻求利润的最优, 也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的、文化的或情感的效益, 参保行为对农民来说越是满意和合理, 就越可能连续参保。

由于缺乏法律上的强制性, 新农保的实际运行十分强调激励机制的作用。这里的激励机制既包括制度设计本身具有的内部激励, 也包括各级政府在实施新农保过程中的外部激励。制度设计本身具有刚性, 其激励作用也是稳定的; 而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外部激励弹性较大, 并且制度的内部激励很大程度上也需要通过外部激励才能发挥预期作用。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3: 外部激励假设。外部激励与农民的连续性参保行为密切相关, 农民感知并认可的外部激励越强烈, 越能够做到连续参保。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于 2013 年 7~8 月对江苏、河南、安徽、四川 4 省首批(2009 年)开展新农保试点地区的农村居民开展的问卷调查。调查涉及的试点地区包括江苏省高淳县及海安县、河南省通许县、安徽省金寨县和四川省仁寿县。调查采取分阶段抽样的方法获得样本, 在每个试点地区通过机械抽样抽取 3~5 个乡镇, 每个乡镇(街道)随机抽取 2 个行政村, 在每个行政村通过机械抽样抽取 25 个农户。然后由调查员入户随机选取 1 名年龄在 16~59 岁的成年人进行结构式访问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约 1 0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856 份。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描述

(一) 计量模型与变量选择

1. 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二分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Logit 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P_i = F\left(\alpha + \sum_{j=1}^m \beta_j X_{ij} + \mu\right) = 1 / \{1 + \exp[-(\alpha + \sum_{j=1}^m \beta_j X_{ij} + \mu)]\}$$

式中, P_i 为农民连续参加新农保的概率, i 为第 i 个农户; β_j 表示第 j 个影响因素的回归

系数; m 为影响因素的个数; X_{ij} 为自变量,表示第 i 个样本的第 j 种影响因素; α 为截距; μ 为误差项。

2. 变量选择与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民的连续性参保行为,包括“连续性参保”和“非连续性参保”两个选项。具体通过“参加新农保以来是否每年都连续按时缴费?”进行测量。自变量包括经济理性、社会理性、外部激励3个方面。经济理性主要是指农民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本文用“对年缴费水平的承受能力”测量投入能力,用“对养老收入的期望水平”测量产出要求。在信息经济学看来,对信息的了解程度决定着行为的有限理性水平,本文用“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测量经济理性选择中信息的了解程度。社会理性指农民参保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其中,社会资本与社会互动等社会结构性因素通过信息共享与信任、规则等促进个体的参保行为。因此,本文用“村庄内和谐程度”和“村庄内信任程度”对社会互动和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并以此反映个体社会理性行动的社会基础。外部激励是指利益驱动和社会动员构成了新农保外部激励的主要内容。本文用“实施新农保以来,当地是否上调过基础养老金标准”测量经济激励程度,用“是否连续被干部动员缴费”测量社会动员程度。连续性参保增加了农民与新农保经办机构互动的频率,这种互动及其体验构成了连续性参保行为链条上的最后一个环节。因此,新农保经办服务水平也是影响其连续性参保的重要外部激励因素,本文用参保农民对经办服务的主观满意评价进行测量。

本文选择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子女数量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到不同经济社会发展地区参保行为的整体性差异,控制了农民所属地区。另外,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子女捆绑缴费政策是影响连续性参保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有没有定居城镇意愿”对农民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进行测量,通过“家里有没有60岁及以上的老人”对受子女捆绑缴费政策的影响程度进行测量。

(二)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样本的基本属性来看,男性占比略高,年龄结构以40岁以上的中年人为主,70%的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近70%的受访者有2个及以上孩子,将近七成家庭有60岁及以上的老人。总体来看,样本基本符合被调查地区农村人口的主要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即使以中年人为主,仍有四成受访者有迁居城镇的意愿;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村庄和谐程度尚可,但对村庄内信任程度的评价较低,这反映了目前中国城乡关系和农村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与新农保相关信息方面,大部分受访者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较低,充分了解的不到15%;大部分受访者的年缴费承受力在400元及以下(占70.5%),但同时44.4%的受访者希望老年后月收入能在450元以上,这说明受访者对新农保的保障水平期待较高;近80%的受访者受到各类参保的动员,对新农保经办服务的评价水平较高,这说明基层政府比较重视新农保工作,工作执行力度较大。

四、计量结果分析

(一) 连续性参保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79.9%的参保者能够连续参保。将参保行为数据与已有连续参保意愿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本文的数据结果与吴玉峰、周明(2014)2011年调查结果非常接近,该文中“可能会”与“肯定会”持续缴费的比重合计为75.43%;与顾文静(2012)2011年调查结果也比较接近,该文中“有持续参保意愿者”为43%，“到时候再说”的为46.5%。由此可见,这次调查数据结果比较接近实际参保现状,但由于因变量的测量问题没有考虑补缴的情况,因此,实际的连续参保率可能要略高于调查结果。从连续参保的意愿和行为数据看,行为要高于意愿,这与一般的行动逻辑相反,主要是因为关于连续性参保意愿的调查都是在新农保实施之初进行的,是对农民观望心理的一种反

映。理论上说新农保的临界投资收益率达8.22%,普遍高于农村一般性投资收益,从投资的安全性、稳健性和收益性上来说,新农保是一种合适的投资选择(薛惠元,2014);也就是说,随着新农保的持续推进,连续性参保意愿和行为都会呈上升趋势,本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没有能够连续参保的被调查者中,“只缴费过一次”的占57.5%，“缴费过两次”的占29.3%，“缴费过三次”的占13.2%。这说明参保后中断存在退出成本,参保时间越长越不可能断保;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新农保政策执行的效应。结合对受访者的访谈资料看,外出务工者通常将参加新农保作为一种“保底性”养老策略,随着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对职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政策的明确化,他们不再需要新农保的“保底性”作用,这可能是造成中途断保的重要原因。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N=856)

变 量	百分比	变 量	百分比
性别		连续被动员	76.2
男	58.3	受教育程度	
女	41.7	小学及以下	24.6
年龄		初中	43.7
40岁及以下	42.2	高中	22.4
41~50岁	33.6	大专及以上	9.3
51~55岁	20.8	有迁居城镇意愿	39.5
56~59岁	3.5	家中有60岁以上老人	64.2
子女数量		新农保了解程度	
1个及以下	43.7	不了解	30.4
2个	35.0	有一点了解	54.8
3个及以上	21.3	比较了解	11.8
所在地区		很了解	3.0
东部	51.8	村庄内和谐程度	
中部	29.9	不和谐	6.5
西部	18.3	一般	47.0
年缴费承受力		和谐	46.5
400元及以下	70.5	村庄内信任程度	
401~800元	23.2	不信任	42.8
800元以上	6.3	基本信任	42.6
老年后月生活费要求		完全信任	14.6
250元及以下	18.0	对新农保经办服务评价	
251~350元	18.3	不太满意	23.8
351~450元	19.3	一般	25.6
450元以上	44.4	比较满意	37.4
基础养老金有过上调	48.3	非常满意	13.1

(二) 连续性参保的影响因素

本文使用逐步回归法得到4个回归模型,模型1是控制变量对农民连续性参保的影响,模型2加入了经济理性变量,模型3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理性变量,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外部激励变量。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农民是否连续参保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回归 系数	发生 比	回归 系数	发生 比	回归 系数	发生 比	回归 系数	发生 比
控制变量								
性别(女性)								
男性	0.465*	1.592	0.387 [†]	1.473	0.414*	1.513	0.418*	1.519
年龄(40岁及以下)								
41~50岁	0.252	1.287	0.230	1.259	0.202	1.224	0.098	1.103
51~55岁	0.081	1.084	0.121	1.128	0.095	1.100	-0.016	0.984
56~59岁	-0.411	0.663	-0.223	0.800	-0.042	0.959	-0.424	0.655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0.332	1.394	0.199	1.220	0.164	1.179	-0.077	0.926
高中(含中专、中职等)	0.650*	1.916	0.389	1.476	0.437	1.547	0.291	1.337
大专及以上	0.496	1.642	0.008	1.008	0.021	1.021	-0.227	0.797
定居城镇意愿(有)								
没有	0.682**	1.977	0.587*	1.798	0.545*	1.725	0.601*	1.824
子女数量(1个及以下)								
2个	-0.471 [†]	0.624	-0.427	0.652	-0.460	0.631	-0.593*	0.553
3个及以上	-1.027***	0.358	-0.828**	0.437	-0.810**	0.445	-0.811*	0.444
60岁及以上老人(没有)								
有	0.269	1.309	0.256	1.292	0.292	1.339	0.409	1.505
所在地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0.165	1.179	0.213	1.237	0.197	1.218	0.191	1.211
西部地区	1.113***	3.045	1.099**	3.000	1.129**	3.092	0.968*	2.633
经济理性								
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不了解)								
有一点了解			0.510*	1.665	0.639*	1.895	0.825**	2.283
比较了解			1.319**	3.738	1.376**	3.959	1.497**	4.469
很了解			-0.008	0.992	-0.217	0.805	-0.465	0.628
年缴费水平承受能力(400元及以下)								
401~800元			0.275	1.316	0.300	1.349	-0.004	0.996
800元以上			0.978	2.659	0.740	2.096	0.771	2.161
对养老收入的期望水平(250元及以下)								
251~350元			0.250	1.284	0.205	1.227	0.240	1.271

表 2 农民是否连续参保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续表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回归 系数	发生 比	回归 系数	发生 比	回归 系数	发生 比	回归 系数	发生 比
351~450 元			0.341	1.406	0.274	1.315	0.312	1.366
450 元以上			0.467 ⁺	1.595	0.223	1.250	0.274	1.315
社会理性								
村庄内和谐程度(和谐)								
不和谐					-0.899 ⁺	0.407	-0.670	0.512
一般					-0.320	0.726	-0.344	0.709
村庄内信任程度(不信任)								
基本信任					0.562 ⁺	1.754	0.461 ⁺	1.586
完全信任					1.374 ^{**}	3.951	1.382 ^{**}	3.981
外部激励								
基础养老金是否上调(否)								
是							0.678 ^{**}	1.970
是否连续被动员缴费(否)								
是							1.295 ^{***}	3.650
对经办服务满意程度(不太满意)								
一般							0.828 ⁺	2.288
比较满意							1.065 ^{**}	2.901
满意							1.064 ⁺	2.899
常量	0.599 ⁺	1.821	-0.043	0.958	-0.144	0.866	-1.833 ^{**}	0.160
卡方值	49.428 ^{***}		66.312 ^{***}		85.230 ^{***}		126.566 ^{***}	
似然值	531.537		513.284		493.908		452.113	
调整后的 R ²	0.130		0.172		0.218		0.312	
样本数	769		745		733		717	

注:括号内为参照组。+、*、**、*** 分别表示在 10%、5%、1%、0.1%水平上显著。

1. 经济理性的影响。比较模型 2 和模型 1 可以看出,当加入经济理性变量后,模型的决定系数从 0.130 提高到 0.172,说明经济理性变量对农民连续参保有显著影响。其中,“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对养老收入的期望水平”影响显著,对政策“有一点了解”和“比较了解”的农民连续参保的发生比分别是“不了解”农民的 1.665 倍和 3.738 倍;相比之下对政策“非常了解”的农民反而并不倾向于连续参保,这可能与他们试图钻政策漏洞的“理性选择”有关。对养老收入期望在“450 元以上”的农民连续参保的发生比是“250 元及以下”农民的 1.595 倍,这说明只有当新农保能产生较高收益时才能对农民连续参保产生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理性变量在引入社会理性变量之后,“对养老收入的期望水平”的显著性消失了,而“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的显著性保持不变;引入外部激励变量后,“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的显著性进一步增强。由此可见,虽然对比模型 2 与模型 1 能够证明经济

理性假设,但通过与模型3和模型4的对比发现,农民的理性选择遵循的并不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因此,农民是否连续参保的经济理性假设没有得到证实。

2. 社会理性的影响。对比模型3和模型2后发现,引入社会理性变量后,模型的决定系数由0.172提高到0.218,说明社会理性变量对农民连续参保有显著影响。与“村庄和谐”的农民相比,“村庄内不和谐”的农民连续参保的发生比下降了59.3%;“村庄内基本信任”、“村庄内完全信任”的农民连续参保的发生比分别是“村庄内不信任”农民的1.811倍、3.733倍。模型3控制了新农保信息了解程度变量,说明和谐的村庄环境有利于形成关于新农保的正向交流感受,并且在村庄内形成关于参保的一致性行为规范,进而促进农民的连续参保。同样,村庄内信任程度除了有利于农民获得有关新农保信息外,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其将村域范围内的信任激发为对国家惠农政策和新农保制度的普遍信任,进而促进连续性参保行为。进一步比较模型4和模型3可以看到,在引入“外部激励”变量后,“村庄内和谐程度”的显著性消失;而“村庄内信任程度”的显著性基本保持不变。由此可见,农民的连续性参保行为是嵌入在村庄社会结构当中的,是通过村庄内社会互动形成关于新农保制度正向社区共识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社会理性假设得到了证实。

3. 外部激励的影响。模型4的决定系数比模型3有大幅增长,表明外部激励对农民的连续性参保行为有重要影响,外部激励假设得到证实。基础养老金“上调”地区农民的连续参保发生比是“未上调”地区的1.97倍;受到连续动员农民的连续参保发生比是未受到动员农民的3.65倍;与“对经办服务不太满意”的农民相比,感受“一般”、“比较满意”和“满意”的农民,其连续参保发生比分别增长了128%、190.1%和189.9%。通过比较外部激励各变量的Wald值后发现,“是否连续被动员”最高(23.942),其次为“对经办服务满意程度”(13.017)和“基础养老金是否上调”(6.733),这说明持续的社会动员是最重要的外部激励因素。在控制了“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后,“是否连续被动员”仍有很强的影响力,说明这里的动员主要是通过村干部的信任、面子、群体压力等促使农民连续参保的情理动员。另外,从模型2、模型3、模型4的决定系数变化可以看到,经济理性、社会理性和外部激励对模型拟合优度的贡献率分别为4.2%、4.6%和9.4%;在完全模型4中通过比较所有显著自变量的Wald值后发现,“是否连续被动员”(23.942)是最具影响力的变量,其次是“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15.104)。可见外部激励的影响力显著高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

4. 农民属性因素的影响。在农民的属性变量当中,性别、迁居城镇意愿、子女数量和所在地区是影响其连续参保的重要变量。在模型1至模型4中,男性的连续性参保要好于女性,这与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高于女性有关。在各模型中,倾向迁居城镇农民的连续性参保比例更低,这说明进城务工和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是已参保农民断保的重要原因。经济理性变量加入使迁居城镇意愿的显著性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倾向迁居城镇的农民更加不关心新农保政策,对政策的了解程度低,从而增加了断保的可能性。子女数量与是否连续参保呈负相关,这反映出农民子女越多,年老后的供养资源越丰富,对新农保的依赖程度越低。在各个模型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参保连续性显著要高于东部地区,但这种显著性随着其他

变量的增加而下降,特别是外部激励变量的加入使地区变量显著性明显下降($p<0.05$)。这说明动员变量充当了地区变量与连续性参保之间的阐明变量,一般来说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连续性参保动员力度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连续参保结果。模型1中,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更倾向连续参保;但随着经济理性变量的加入,其显著性在模型2中消失了。这说明受教育程度对连续参保行为的影响本质上是农民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家中是否有60岁以上老人对连续性参保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参保捆绑政策没有能够持续发挥作用。通过对经办机构的访谈看,东部一些地区一开始就没有执行捆绑政策,中西部地区也没有严格执行,一些参保者在父母开始领取基础养老金后选择断保。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中国4个较早试点新农保省份的农民样本的频次统计和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了农民参加新农保的连续性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农民的参保行为仍然存在着自愿性不足的问题。提升农民参保的自愿性对新农保制度的成败至关重要,在经历了3~4年的政策实践之后,这种自愿性不足仍然明显,具体表现为:(1)连续性参保率不高,有将近两成的参保者出现断保行为。(2)农民的参保行为更多反映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和村庄社会结构制约的结果,而不是个体的经济理性决策。从回归结果看,“是否连续被动员”、“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对经办服务主观评价”和“村庄内信任程度”是最具影响力的变量。由此可见,农民连续参保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新农保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激励水平,对村庄内信任所产生的社会情理规范的遵从。无论是激励还是遵从,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而非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内在认同。

第二,农民的参保行为反映了“双重嵌入性”结果。格兰诺维特区分了“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可见社会行动的嵌入涉及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农民的参保行为一方面受到村庄内人际关系网络中和谐社会互动形成的信任和规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更为宏观的城市化进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及家庭人口结构等制度、文化因素的影响。

第三,在新农保实施初期,政策执行上的激励作用要强于利益激励。新农保制度成功实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是解决逆向选择问题,从连续性参保上来说主要是通过激励机制实现“长缴多得”。这里的激励机制包括管理和利益上的激励两部分。管理上的激励是指提高政策熟悉程度和经办水平、参保动员等,也就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新农保执行;利益上的激励主要是财政补贴机制,即新农保制度设计。由于制度的刚性和巨大的财政成本,新农保实施初期主要通过加大政策执行力度来激励农民参保,并且从本研究的回归结果看,政策执行激励变量的影响力要高于利益激励变量。但随着新农保的持续实施,这种政策执行层面上的激励是否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还需要进一步追踪研究。

总的来说,农民连续参保的关键在于通过合理的激励机制解决其参保动力不足的问题,从行为惯性和断保成本的角度来说,今后一段时间对于农民连续性参保行为的养成十

分重要。在政策建议层面上有两个思路可以考虑。首先,应从政策执行激励机制转向利益激励机制。当前的新农保政策执行带有浓厚的社会动员色彩,这种机制虽然有助于实现目标,但效果不具备可持续性(王礼鑫,2015)。特别是在农民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不断提高和经办服务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农民的参保行为更趋向于经济理性。这就要求管理者适时加大利益激励力度,根据物价变动指数和经济发展水平定期上调基础养老金,按照“累积效应”原则进一步明确长期连续缴费与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之间的计算关系,同时增加断保后补缴滞纳金。其次,应适时启动“强制性”参保原则。新农保本质上属于政府补贴型自助社会养老保险,而“强制性”是社会保险的最根本原则。排除转投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断保后再续保两种情况,新农保的实际连续性参保率还是较高的,这为实施“强制性”参保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应赋予地方政府在新农保“强制性”参保上的立法权,积极推动在有条件的地区将新农保制度由“自愿参与”转为“强制参与”。

参考文献:

1. 邓大松、薛惠元(2010a):《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替代率精算模型及其实证分析》,《经济管理》,第5期。
2. 邓大松、薛惠元(2010b):《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推行中的难点分析——兼析个人、集体和政府的筹资能力》,《经济体制改革》,第1期。
3. 顾文静(2012):《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参保激励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佛山市的调查》,《人口与经济》,第1期。
4. 黄瑞琴(2013):《贫困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两个贫困族自治县的调查》,《社会保障研究》,第1期。
5. 贾宁、袁建华(2010):《基于精算模型的“新农保”个人账户替代率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6. 贾晓华、徐世江(2012):《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性的经济学分析》,《生产力研究》,第7期。
7. 林义(2009):《破解新农保制度运行五大难》,《中国社会保障》,第9期。
8. 刘向红(2011):《影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若干制约因素》,《农业经济》,第8期。
9. 马杰、陈玉照(2013):《可持续:新农保生命力的实证考察》,《当代经济管理》,第5期。
10. 王礼鑫(2015):《动员式政策执行的“兴奋剂效应”假说》,《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11. 文军(2001):《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12. 吴玉锋、周明(2014):《农民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忠诚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13. 薛惠元(2012):《新农保个人筹资能力可持续性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14. 薛惠元(2014):《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缴费意愿的可持续性分析》,《西北人口》,第2期。
15. 张永春等(2014):《“新农保”筹资机制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16. Coleman, J.S. (1990),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李玉柱)